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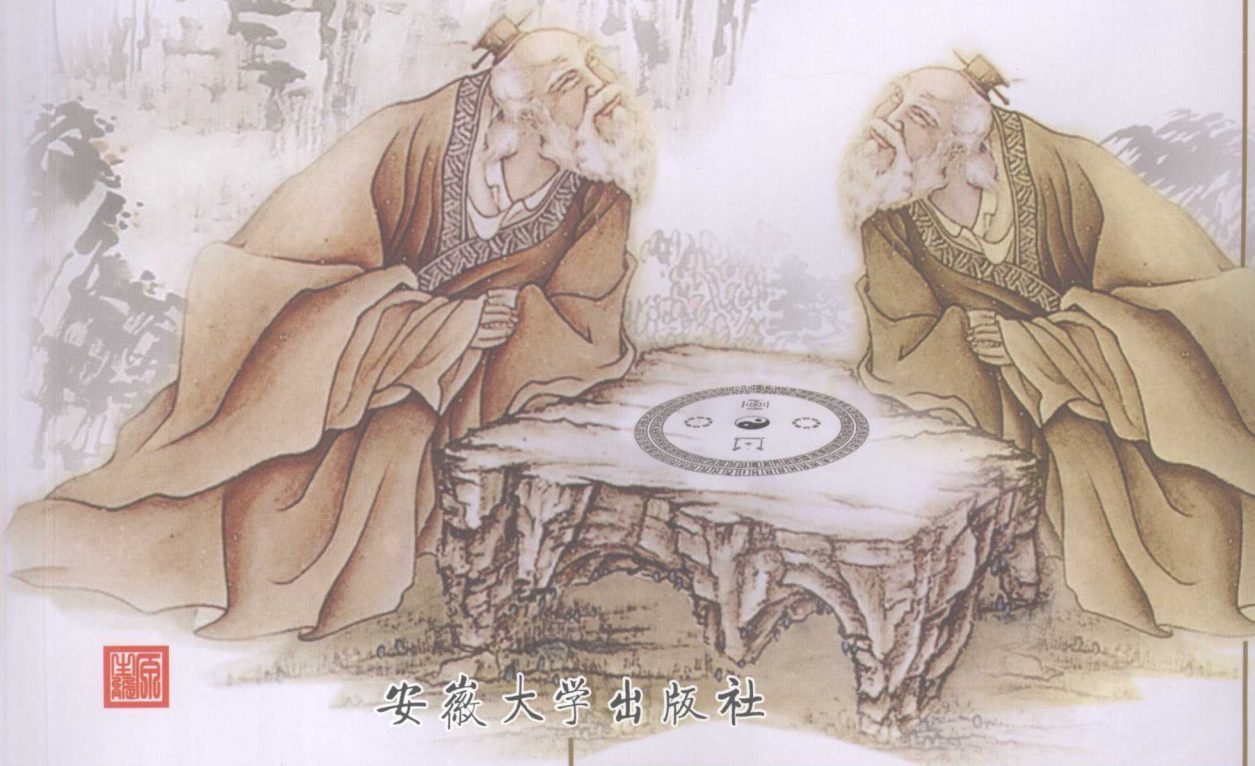
本色道儒

周易道德经论语新视角之二

阳明宇 著

（禁版）

正言若反 大为无为 斯道精也
各安其位 修己利他 乃儒魂哉



安徽大学出版社

本邑道稿



本色道儒

周易道德经论语新视角之二

阳明宇 著

（第1版）



安徽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本色道儒/阳明宇著. —合肥: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4

ISBN 978-7-81110-429-5

I. 本... II. 阳... III. ①道家②老子—通俗读物③儒家

④论语—通俗读物 IV. B223.1-49 B222.2-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4779 号

本色道儒

阳明宇 著

出版发行	安徽大学出版社 (合肥市肥西路3号 邮编 230039)	经 销	新华书店
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5107145 发行部 0551-5107784	印 刷	合肥现代印务有限公司
电子信箱	ahdxchps@mail.hf.ah.cn	开 本	1/16 710×1000
责任编辑	杨国平	印 张	22.75
封面设计	孟献辉 黄 琴	字 数	372 千
		版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1110-429-5

定价 32.00 元

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卷首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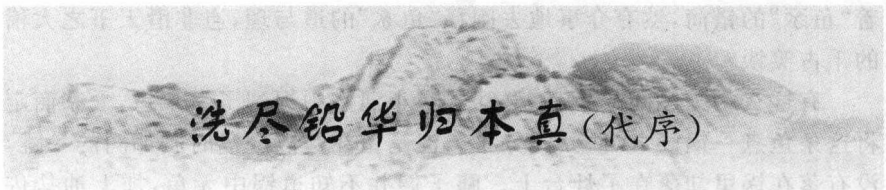
进入 21 世纪后,随着现代化弊端的充分显现,陷入现代化困惑中的人类会对自己的演进历史予以理性的反思与检讨,去寻找造成现代化困惑的根源。一旦生发出欧洲文艺复兴带给人类的究竟是福还是祸的疑惑,觉醒的人类不仅会回过头去重新认识各类宗教禁欲的教义之价值,而且更会从远古文化中去搜求一种能将人类从深重危机中解救出来的古文化,并赋予其拯救人类的使命。最终,搜求的目光定会聚焦在中华民族文化上。

至 21 世纪中叶,当人类充分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易简的特质及全方位、立体型思维定势之科学时,必定能达成“人类需要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文化能够拯救人类”的共识。

然而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尤其是原创的思想文化在传承中却被层层脂粉涂抹得失去了本色,严重地影响了包括黄炎子孙在内的整个人类对中华民族文化的正确认识。撰写《本色周易》《本色道儒》两部书稿,一方面想通过对《周易》《道德经》《论语》所作出的立足元典、忠实元典的全新解读去洗尽涂抹在其外表的厚重铅华,使其复归本真;另一方面更想通过书稿去回答“怎样解读民族文化元典”这一弘扬民族文化必须予以明确回答的启蒙课题。

我不期待读者能认同书中的观点,但却企盼着立足于元典的批判。只要读者能将认识民族文化的目光定格在元典上,作为一块引玉的粗砖,即便书稿被用于“覆瓿”,我也会因著述初衷的实现而倍感欣慰。

愿全体黄炎子孙能真正认识到中华民族文化之于人类的价值,钟情民族文化,传播民族文化,为迎接迟早就要到来的中华民族文化、华夏文明的伟大复兴而热身。



洗尽铅华归本真(代序)

解读民族文化元典存在的问题及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一

都说中华民族文化博大精深。然而博大精深的民族文化,尤其是原创的思想文化元典在传承中却被层层脂粉涂抹得失去了本色。

拿周易来说(注:周易并非一本书,故除个别地方外,均不加书名号),她是中华民族远古祖先用似乎是来自神启的顶级智慧建构起来的一座令人类社会叹为观止的“文化金字塔”。其无与伦比的哲理思辨及科学底蕴,足以奠定她在人类思想文化、科学文化史上的巅峰地位。然而在传承流变过程中,不仅蒙上一层厚重的玄学污垢,被贴上不可知神秘文化的标签,甚至沦落成江湖术士的行头,几乎与巫术等同。

一部《周易》,数千年来研究者众若繁星,著述汗牛充栋,观点五花八门,然而相当一部分研究成果为什么留给人们的只是一种“是耶非耶”的感觉?

古今中外不乏众多对周易心存“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之执著学者,然而为什么却未闻有谁真正经历过“众里寻她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情感震颤,取得突破性成果?

基于这两个为什么生发出如下三点疑虑:

周易的研究是否存在将“易简”的天地之道人为地复杂化,将本属于“百姓日用而不知”的浅显道理人为地神秘化之倾向?假如存在着这种倾向,会不会导致研究方向的南辕北辙?明明只有百里之遥的直线距离,弄得走上了十万八千里却越来越找不到目的地?

电视娱乐节目中有一种“传话游戏”,几个人带着耳幔排成一排,一个接一个地往下传话。倘若第一位说“吃饭”,第二位传出去的可能是“参观”,第三位传出去的可能是“装蒜”,第四位传出去的则可能是“扯淡”……周易的研究是否存在从“吃饭”到“扯淡”这种以讹传讹的讹误?假如存在着这种讹误,那么当“鲁亥”的版本成为“鱼豕”的错简后,我们却抱



着“鱼豕”的错简，煞有介事地去阐释“鱼豕”的道与理，岂非滑天下之大稽的千古笑谈？

有这么一则民间故事：一群瞎子在小河沟中捉到了一条鱼，大家商定将这条鱼煮一锅汤，以便共同分享。但是鱼在被放进锅时刹那间一跳，没有落在锅里却落在了灶台上。瞎子们并不知道锅中无鱼，加上油盐佐料煮了半天，然后每人分得了一碗意念中的鱼羹。于是大家一边品尝一边交流着各自的心得：有说鱼头在自己碗里，鱼头的活肉如何滑嫩；有说吃到了鱼尾，肉虽少却也耐人寻味；有说鱼肚上的肉刺少；有说鱼背上的刺虽多了些，但肉却很厚实；甚至更有人还煞有介事地声称自己被鱼刺咋到了喉咙……品过之后，一瞎子收拾灶台，顺手摸到了原本应该被大家吃进肚里而事实上却仍躺在灶台上的这条鱼。周易的研究是否存在着这类瞎子品鱼、瞎话连篇的问题？假如存在着这类问题，那么故弄玄虚中能有几多真实可信的成分？

上述几点疑虑倘若并非空穴来风，周易的研究是不是应该去想一想这样一个有必要去想一想、也值得好好去想一想的问题：我们是在研究周易还是在研究一种心造的幻影、一个根本不存在的虚无？如果弄错了研究对象，会不会将周易这一内蕴着顶级智慧、顶级科学的伟大的思想文化、科学文化弄得面目全非，声名狼藉，使浅显的道理被艰涩取代，科学的灵光被污垢蒙蔽？《四库全书·易类小序》勾勒出了一条周易在数千年中的流变轨迹：“故《易》之为书，推天道以明人事者也。《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距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焦，入于机祥；再变而为陈、邵，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相互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医学、算术，以逮方外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从这一流变轨迹中所能见出的恐怕只是周易的日趋衰落。

周易的命运可以说是中华民族文化元典的共同命运。在对民族思想文化从宏观上进行比较研读的过程中，我见到了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无论哪家哪派的原创文化元典，只要经过一至两代的衣钵传承，立马就会荒腔走板，变质变味。且这种变并不是任何一种文化在传承过程中所期待的青出于蓝胜于蓝的发扬光大，发生的变异所显现出的均是以一代不如一代的狗尾续貂为特征。



以道、儒两家文化而论，道家崇老、庄，儒家尊孔、孟。但咀嚼《庄子》，虽不好说多出老子的是一股玩世不恭味，然而却读不出《道德经》的深沉；细品《孟子》，虽不好说胜过孔子的仅在狂傲与极端，然而亦感受不到《论语》的厚实。其他家（派）的文化更是如此：法家文化“与时俱进、变法图强、重视他律、约束行为”的主题被虚置，却开发出了“权术”之系列产品；兵家文化“止戈为武，用战争制止战争”的思想被废弃，孕育出了一个兵家文化的怪胎：集阴谋文化之大成，不知给整个民族带来了多少灾难的“三十六计”；纵横文化背离“用外交斡旋的手段解决争端，在求大同存小异的共识下和平共处，以实现社会安宁”的中心思想，留给后人的研究成果却是舌底生花的本领与卖身投靠的德行；阴阳五行及风水文化，不能从五行的生克制化中读出制衡与和谐，从风水中读出环境对人的影响，却读出了宿命，读出了富贵穷通；墨家文化“平等、博爱、节俭”的思想未能得到充分发掘；名家文化“循名责实”的主张被弃置一旁；农家文化“重农固本”的主题遭轻视冷落……如此等等。面对民族文化元典在传承中所存在的严重失真问题，我觉得民族文化的研究工作当务之急恐怕应以“洗尽铅华归本真”为重点，进行一场抢救民族文化元典的运动。三魂七魄之说不知始于何时，然援引三魂七魄之说去比况中华民族思想文化，还真有三魂七魄的存在。《周易》《道德经》《论语》便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三魂”，法、墨、兵、纵横、阴阳、名、农等家（派）的原创文化元典，便是中华民族思想文化的“七魄”。假如魂出窍、魄失位，民族思想文化也就成了没有精气神的躯壳。因此，所谓“洗尽铅华归本真”，说到底便是要通过对民族文化元典的重新解读，为民族文化元典招魂唤魄。

二

民族文化元典为什么会在传承中存在严重失真问题？从客观上讲与民族文化元典自身的缺陷息息相关。

第一，中华民族的文化总体上属经验文化，从一定意义上说可称之为警句格言文化，其真知灼见往往只表现为寥寥数语。没有经验的积累和心的灵犀，很难读得出它的真谛。

第二，中华民族文化深邃的思想，往往采取了“王顾左右而言他”的表达方式，缺乏感悟言外之意的灵性，很难进入其思想宫殿的大门。

第三，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有如散金碎玉，散见于各家各派的著作里，精华与糟粕杂陈。且各家各派的学说，多相互诋毁、相互排斥、缺取长



补短、交流融通。因此,虽各家各派的学说均有可圈可点之处,终因囿于门户之见,难集民族文化精华之大成。

正因为民族文化元典自身所存在的上述缺陷,从而在客观上也对研究民族文化元典的学者之个体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假如在解读元典时与元典的作者缺乏跨时空的对话,那么对元典所作出的解读便很难达到心领神会的境界,取得融会贯通的效果。读不同时代学者解读先秦诸子元典的读本,为什么总有一种鸡汤兑水品不出原汁原味的失真感觉?因为解读者并未成为元典的知音。

从主观方面找原因,一是源于前人治学方法的缺失。前人治学习惯于化整为零。对于文化元典的研究,在没有把握住这一文化的内核及整体结构之前,首先就来一个大卸八块,然后告诉世人,这块肉叫什么肉,有几种叫法,营养价值如何,那个内脏是干什么用的,有哪几种吃法,便大功告成。以对周易的研究而论,没有把握住周易的世界观、方法论、思维定势,没有把握住周易体系的框架结构,更没有复制出周易这座宫殿的建筑施工图纸,便将这座宫殿拆掉,去研究它的砖、它的瓦、它的木材、它的石料,这样也就不可能有对周易的正确解读。

化整为零的治学方法,必定会导致舍本逐末的结果,所获只在皮毛而非精髓要义。翻开西汉以降历朝历代对民族文化元典的训诂、注疏,直刺人嗅觉的便是一股浓浓的学究气。训诂习惯于在烦琐的考据中夹杂卖弄,注疏更是习惯于寻章摘句,断章取义,诠释注解,望文生义,胶柱鼓瑟,削足适履。且无论是“六经注我”抑或“我注六经”,注来注去多与元典的本意相距千里。使得优秀的民族文化元典,在训诂与注疏中被肢解阉割,整容变形,精华往往变成糟粕,厚重的污垢掩盖住了文化瑰宝璀璨的本色。更为可怕的是这种治学方法却一代一代地传承了下来。为什么对理论前沿有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思想体系的要求?矛头所向就是直奔这种化整为零的治学方法而来。

二是要从传统教育中去刨根源。中国传统教育的教学方法就是灌输式。死记硬背使中国的文人始终未能养成定义概念的习惯和重视发掘概念内涵的自觉。即使是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的基本概念,假如要问及所讲概念具有怎样的内涵,要么会让人难堪,要么一百个人就会作出一百种理解。这是中国传统教育所留下来的痼疾,同时亦是中国社会的一大景观,历朝历代历来如此。拿“文化”这个概念而论,时下它是个十分走俏、十分时髦的概念。某个地方有某种拳头产品,便有某产品文化,



弄出个某产品文化节；盛产某种作物，便有某作物文化，弄出个某作物文化节；出了某位名人，便有某名人文化，弄出个某名人文化节；甚至出了位美女也要弄出个美女文化、美女文化节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文化”是什么？就其原始意义而言即“以文化之”，与“教化”、“开化”近义。原本是个动词，指称的是用一定的思想理念、伦理规范教化万方，使人类摆脱野蛮、愚昧与贫穷，即儒家所称的“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基于这一原始义派生出：一是广义的“文化”，指称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与精神财富的总和；二是狭义的“文化”，指称社会的意识形态。精神财富的本身就是思想理念的集合体，物质财富也是基于一定思想理念的指导创造出来的，社会的意识形态包括社会制度、道德伦理更是一定思想理念的产物。由此观之，“文化”的内核应当是“一定的思想理念”。“文化”除作上述解释外，还有两层衍生义：指称一切知识，如“学文化”；指称气质与修养，如“没文化”。但这些意义均脱离不开“文化”这一概念的基本内核。“文化”需要一定的载体与传媒体，当某种载体与传媒体所传递出来的文化信息较为固定时，这一载体与传媒体便成了所传递的文化信息之代名词。譬如中华民族的茶文化、酒文化，便是清雅文化、侠义文化的代名词。从茶文化中删除“清雅”的内蕴，从酒文化中抽出“侠义”的豪情，茶与酒便成了两类饮品，其文化的含义只能同万千商品一样都是人类社会所创造的物质财富。人是思想的载体，但同时也是文化的对象。孔子的思想文化了两千多年的中国知识阶层，基于他的思想所建立起来的道德伦理规范也文化了两千多年的中华民族。这是思想的功能，孔子是这一思想的载体，他所创立的儒家学派才是文化的载体。“孔子思想”、“儒家文化”虽然可以相互替代，但站在使用概念的层面上，只能称“孔子思想”而不能称“孔子文化”。混淆了概念的内涵，或者对概念的内涵可以仁智互见，也就不复有概念的存在。

做学问最重钉是钉、铆是铆的较真劲，对民族文化元典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如果都不能赋予其确定的内涵，失真是必然，不失真才是怪事。譬如周易，她的真面目其实就在基本概念、基本概念相互之间的关系、基本问题的基本原理之后，揭示出了基本概念的内涵，梳理出了基本概念相互之间的关系，阐述清了基本问题的基本原理，原本云遮雾障的周易立即便会显现出她光彩照人、夺魂摄魄的情姿。可是，数千年来周易所涉及的一系列基本概念有几个说清楚了？就连在研究界基本上已达成共识的“周易就是周代之易”这一概念定义，也是一个错得过于离谱的定义。周易是



什么？周易就是“道理”，扔掉了“周之道”，何来“易之理”？

中国古代文人们不仅缺乏定义概念的自觉，同时更缺乏的是批判精神。书上说什么就是什么，先生说什么就是什么。书上说“幽王烽火戏诸侯”，谁也不去想从骊山狼烟起到各烽火台连锁举狼烟至周边诸侯点集兵马奔赴京畿需要多少个时辰。恐怕从傍晚举烽火至拂晓时分有一支兵马能够赶到便已经称得上是快速反应了，恐怕兵马未到褒姒早就哈欠连天了。老师说井田制就是全国的土地呈井字状，八家共耕中间一块公田。谁也不去想如果将全国的土地弄成井字状，这是一个怎样的工程？哪朝哪代能有这份能耐？在古代的典籍中、在先生的话语中，类似这种不经一想、不值一驳的内容可以说俯拾皆是，能信么？

当社会上有识之士生出民族文化断层之忧时，我总是在想只要中国的知识阶层稍许有一点批判精神和独立思考意识，中华民族的文化元典绝对不至于像眼下这般无精打采，缺乏应有的精气神。

三是门户之见所形成的“王小二卖瓜，自卖自夸”。中国的读书人很看重“师承”二字。立足于“尊师重道”论“师承”，它是民族的美德，当然应弘扬；但假如这“师承”二字着上了“小农”色，那么“师承”便很有可能成为“自我封闭”的代名词，整个学术界在客观上就会变成“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小国寡民式之学术家邦。学术壁垒、门户之见便是学术界的小国寡民之产物。任何一种文化不可能达到尽善尽美的境界，周易一个最为基本的观点便是认为宇宙间不存在有个体的完美，完美只能来自互补。人类社会除却周易这一“易简文化”以其所特有的全方位、立体型思维定势通过显现出宇宙整体的完美而实现了自身的完美而外，无论哪家哪派的文化，都是具体思想的结果，都是平面思维、中心思维的产物。由于各自的立足点不同，所以必然会存在着由不同立足点所决定的这样或那样的偏失。当然，“各人的孩子各人疼，各人的父母各人爱”，“文章是自己的好”，这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但千万不能围绕“完美”二字去做文章，过于拔高其结果恐怕会适得其反。一幅书法作品留下一些败笔很正常，只要瑕不掩瑜就应肯定。但如果去描摹修补，最有可能出现的结果便是画虎不成反类犬。脸上有点细微雀斑原本无伤大雅，淡施脂粉可以，如果像油漆家具般又是刮灰、又是打磨，又是上色、又是刨光，见不到本色不说，还会给观众带来视觉污染。而民族文化元典在传承中各家各派偏偏要去追求一个尽善尽美，达不到尽善尽美的要求便通过文过饰非来护短，这样一来失真也就在所难免了。



当然，除上述几个方面的原因外，学术上的名人崇拜，以做学问为名图终南捷径之梦，以及一些学者在做学问过程中投机取巧、吃现成饭的心态等等，都是导致民族文化元典严重失真的重要因素。

三

民族文化元典在传承中的失真所导致的严重后果便是民族文化主流难以形成。对“民族文化”这一概念的理解，我认为应当是指该民族所信奉的，对民族心理、民族思维定势、民族性格的形成起潜移默化作用，进而对民族素质、民族形象产生直接影响的思想理念。它不应包含民族文化宝库中的“珍品”，仅指在运作层面上实际被运用的民族的实用文化。存款是财产，但由于退出了流通领域便失去了货币的功能，要想进入流通领域，就得去银行将存款取出来，其间的道理便是这般浅显。

站在实用的角度去审视中华民族的实用文化，就不难觉察到中华民族文化其实是一种由多元文化组装而成的多面体文化。先秦时期，是民族文化的原创期。三教九流文化互争雄长，诸子百家相互争鸣，民族文化在短时间里难以形成主流。西汉以降，虽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说，然只有独尊之名，而无独尊之实。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中，儒家文化不是作为文化被推崇，而是作为一种统治术受青睐。事实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均是将儒家文化视成是一种门面文化、包装文化。在儒家文化之外，统治者还运用道家文化（改造过的）为落魄之士准备了一副精神枷锁；运用佛家文化（改造过的）为平民百姓打造了一个精神囚笼。而在统治权的实际行使上，则更偏重于法家权术文化、兵家阴谋文化（均是被改造过的）的运用。致使我们读二十五史，读来读去只能读到四个字：“权术”与“阴谋”。

统治者基于巩固统治的需要，从先秦时代民族文化元典中取其所需，为其所用，实际上是对文化元典的肢解整容，虽在名义上冠以某家文化之名，内容上则属于一种新的文化，即封建官场文化。与此同时，士阶层与平民市井阶层亦起而效法，基于维护各自利益之需要，亦对三教九流文化元典进行适合本阶层口味的移植与改造，衍化出了士阶层文化与平民市井文化。这样，先秦时期诸子创立的民族文化元典便整体上为这三大系列的文化所取代。自汉至清至民国，中华民族文化一直是保持着封建官场文化、士阶层文化、平民市井文化三足鼎立的文化态势。可以这么说，有着七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却始终未能形成运作层面上的中华民族的



文化主流。

多元文化的共存且旗鼓相当,直接造成了中华民族伦理道德规范的驳杂。对于同一伦理道德规范,三种文化均可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作出不同的解读。因此,伦理道德规范相互之间的冲突、碰撞与对抗,在民族文化中可信手拈来、俯拾皆是。譬如在改朝换代的社会大变革年代,原属旧的统治集团之成员投靠新兴的政治力量,面对违背“忠臣不事二主”的道德信条而被指责为“不忠不孝”之人时,变节者同样是振振有词:“识时务者为俊杰”……一个民族假如形不成相对统一的道德评价标准体系,形不成比较一致的是非观、美丑观,这个民族的凝聚力就要大打折扣。

封建官场文化实际上是一种心传文化,借用一句佛家语即“不可说”文化。其文化基因是“家天下,官本位”,立足点在“保富贵”,特征就是“说的不做,做的不说”。一个民族假如认同了“说的不去做,做的不可说”的文化理念,往往会形成空头政治、大话政治、口号政治,养成务虚不务实的工作作风;形成“既要当婊子,又要竖牌坊”的民族心理,“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的民族思维定势,言行不一、表里不一的民族性格,这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和整体形象就会受到大的贬损。

士阶层文化、平民市井文化虽然与封建官场文化有所不同,但却与封建官场文化有着一个共同的内核:“富贵”。所不同的是封建官场文化突出一个“保”字,士阶层文化突出一个“求”字,平民市井文化在欲富贵而不能的情况下只好表现出一个“嫉”字。所以三大系列的文化质言之是“保富贵”、“求富贵”、“嫉富贵”的糟粕文化。尽管在三大系列文化里,不乏精华文化的存在,但由于被构建进了整体上属于糟粕文化体系之中,也就显不出精华的特质,见不到优秀的灵光。就以“劝学”为例,士阶层文化是十分看重读书的。但这种看重,并不是认为读书是提高民族素质所必需,是国家的富强、民族的振兴、社会的发展所必需,而是将读书视为求取富贵的手段和途径予以强调。因此,士阶层文化的劝学是非常功利化、直观化的劝学:“学好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车马多如簇”……爵禄、金钱、美女、权势在天下读书人面前摇过来、晃过去,刺激得人人囊萤映雪、悬梁刺股。一旦富贵到手,谁还记得书中的道、文中的理?这样的文化,同样只会导致出民族性格的知行分离、言行不一。

以“求富贵”为特质的士阶层文化,注定了士阶层在中国历史上“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角色定位。翻开中国历史,多少动乱、多少阴谋,有几



回、几次与“士”无关？有奶便是娘，毕竟还是依附现成权势。但中国的一些“士”，为求得一己富贵，只要他认定了你有产生奶水的潜质，可以先行下注，认下你这个娘，然后再促成你怀孕、生育、产奶。与一个人、几个人的富贵比，人民的福祉、国家的安宁、民族的利益统统比鸿毛还轻。

平民市井文化，虽然说不不可一概而论，然而基于“嫉富贵”三字，不仅使民族性格、民族心理和民族思维定势出现了损人不利己的病态与畸形，甚至直接为黑恶势力的形成提供了文化土壤。在平民市井中，对“英雄”的解读往往是谁敢同富贵、权势作对，谁就是英雄。听到了“劫富”、“锄强”，虽明知不会“济贫”、“扶弱”，但就是觉得解恨，从心理上产生出一种本能的满足。正是因为平民市井文化视“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的侠客为英雄，视啸聚山林、落草为寇的强盗为好汉，所以历朝历代的黑恶势力都能从平民市井文化中获得道义上的支持与肯定。我也读过《水浒传》，但没有看见梁山有好汉，只看见水泊尽枭雄。梁山水泊是一个典型的黑社会势力麋集之地。一百零八将真正被逼上梁山的其实能有几个人？智取生辰纲，就算是黑吃黑，然而哪朝哪代能容忍这种抢劫犯罪的存在？身为县衙衙吏，置国家的法纪而不顾，为犯罪分子通风报信，哪朝哪代能褒奖这一犯罪行为？但是，平民市井中却崇拜这梁山水泊一百零八将，认为他们人人是好汉，个个是英雄。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文化基础、文化土壤又在哪里？

然而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恰恰在于：封建官场文化也好，士阶层文化、平民市井文化也罢，它的绝大多数文化理念却能附会在儒家、道家等民族文化元典的名下。原因在哪里？一句话，都是对民族文化元典所作出的失真解读种下的祸根、造下的孽。

四

民族的主流文化是民族的灵魂，更是民族心理、民族思维定势、民族性格的遗传基因，对民族素质、民族形象起着至关重要的决定作用。只有先进的文化才能造就出一个强大的民族，才能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大才明确提出了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软实力之理论命题。解决民族文化元典在传承中的失真问题，关键是要回到民族文化元典上来，重新认识 and 解读文化元典，彻底清除覆盖在文化元典之上的污垢，还民族文化元典的本来面目。这既是弘扬民族优秀文化、构建民族主流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需要，也是中国共产党始终代表



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之具体体现。如何解读民族文化元典？我认为应遵循这样几条基本原则，即：立足整体、把握分寸、突出主干、显现神韵。

第一，立足整体。就是要从整体上把握文化元典的原创思路与架构。对周易的研究为什么研究来研究去却研究出了一个“谁都说不清”？原因就是没有能从整体上去把握她的思路与架构。只要能立足整体用立体的眼光去看周易，便能清楚地见出周易只是建立在宇宙结构对称、运动平衡基础上的一种全方位、立体型的思维定势。抓住了周易这个“质”，也就不至于说到周易就认为是“蓍占”，将训练周易思维定势的作业看成周易之本身。拿儒家文化来说，其原创思路是十分明晰的，即由“孝”致“和”。一个“孝”字，是儒家原创文化的立足点；一个“和”字，是儒家原创文化所设定和追求的最高社会理想。基于“孝（悌）”生发出“忠（信）”，基于“忠（信）”实现整个社会的“和（顺）”，是解读儒家文化元典的钥匙。“孝”为“德”之基，“德”的实质是“中正”，它是修养的最高境界，有“德”的修养才会有“德治”；“孝”为“仁”之门，“仁”的实质是“中和”，它是处世的最高境界，有“仁”的处世，才会有“仁政”。用修身以“德”、处世以“仁”这两大支柱去支撑起一个和谐的社会，这就是儒家文化的基本架构。其他所有的思想观点，均是用来建筑这座文化大厦的木材与砖瓦。

孔子整理编纂六经，用意亦十分明显，目的就是让六经共同作用于儒家最高社会理想：和。《周易》阐述的是整个宇宙在大联系中的大和谐；《礼记》是欲在明确的等级秩序基础上，构建人类社会的整体和谐；《尚书》是欲通过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在弘扬先王之道中实现统治的和谐；《春秋》是欲发挥史鉴的功能，在明治乱之源中实现和谐；《乐经》着眼于移风易俗，用教化大行创造和谐；《诗经》立足于陶冶情操，用温文尔雅的高素质去保障和谐。

“立足整体”基本的要求便是要“重大格局，扫学究气”。有大卸八块、化整为零的治学方法在，明明是想解读元典，但在不自觉中写着写着便写成了“古汉语教材”，写成了“历史典故考据学”，而且在一种惯性的推动下会习惯成自然地采用“直译”的手法去解读。解读古代文化元典与外文的翻译大同小异，最蹩脚的翻译就是“直译”。譬如将“娘的希匹”来一个汉译英，只能译为“母亲的生殖器”。然而任何语言都是用以表情达意的，离开具体的语境，“母亲的生殖器”所表的是什么情？所达的是什么意思？如果不直译，仅告诉人家这是一句骂人的话同样不对，因为“娘的希匹”只是“情感助词”，表达愤怒情感时是愤怒情感的助词，表达喜悦情感时是喜悦



情感的助词，表达无可奈何情感时是无奈这种情感的助词……直译立足的是字词本身的含义，将文章变成了辞典，最不足取。直译出来的东西不仅读不出原著的韵味，甚至连原著的基本思想、基本内容都被搅得一塌糊涂。一部《尚书》，解读的注本盈千累万，但即使你读尽了天下所有注本，最终还是读了个不得要领、不知所云。原本是一篇篇整体文章，一经直译便被弄得支离破碎，井然有序的思想体系被弄得杂乱无章，了无韵味可品。譬如《禹贡》讲大禹治水，明面上讲的是治水，实质上则是在借治水设喻阐述治国治民的大道理。中华民族国家的诞生自大禹始，没有国家便没有规范与约束，人民便如洪水一般泛滥成灾，所以必须要建立起国家这个组织，对人民的行为予以规范，直译怎么也体悟不出其间的深意。我对陈列在新华书店书架上《白话X》之类的书籍不以为然，读书的时候在作业与考卷上出现一些古文直译的试题为的是检验一下学生对古汉语的语法及古文字的掌握程度，这是必要的，但是如果将古代的典籍均来一个全面的白话直译，中华民族的文化典籍便会大大贬值，至少感受不出古代典籍意味隽永的美。

第二，把握分寸。真理与谬误其界限就在一个度的把握上，超出了这个度，势必会导致正经歪念。譬如老子讲“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你将其读成了“常道不可道，常名不可名”；老子讲“无”，你将“无”读成了“什么都没有”；老子讲“无为”，你将“无为”读成了“无所作为”。这样一来，老子的《道德经》只好往废纸篓里扔。再譬如孔子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一旦变成“富贵于我如浮云”，孔子这句话所表达的思想也就完全被歪曲。在对民族文化元典的解读中，这类不着痕迹抹去真理与谬误之间的界限，变歪理为正说的事情，可以说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现象，是一种通病。譬如“孝”是儒家所欲建立的道德伦理规范的基点，倡导孝行不仅应该，而且必须。但是翻翻二十四孝图对“孝”这一德行所作的解读，却存在着许多荒谬的内容。“郭巨埋儿”假如这个“儿”真的被活埋了，郭母恐怕从此会整日以思孙之泪水洗面；六岁的陆绩到人家做客便手脚不干净，怀桔而归，被发现后，便以拿回去给母亲吃来遮羞，就算真的是拿回去给母亲吃，怀桔的行为也属不洁，能算得上是孝么？如此等等，倘若依二十四孝所倡去行孝，倒不如不要这种孝行好。读《论语》我们所感受到的是孔子思想的人性、务实，儒家原创文化的优秀与鲜活。为什么原本非常人性、务实，十分优秀且十分鲜活的儒家原创文化，变成了落后、守旧、阻滞社会进步、僵死且失去人性的文化？即使有政治上的原因，最终



还得归咎于后世儒者对孔子思想解读不切实际的拔高。“五四”砸孔，青年人把中国人受列强欺侮的窝囊气一股脑地撒在孔子身上，把中国近代社会的落后这笔账全部记到了孔子名下，应当说“万代师表”的孔子是代后世传承其衣钵的一些徒子徒孙们受过。孔子其实是非常看重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富民”、“教民”的思想，孔子对管仲相齐政绩的高度评价便清楚地反映出了这一点。而且，儒家原创文化也是一种十分人性化的文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教人换位思考；“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教人将心比心；“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教人像对待自己的父母子女一样尊老爱幼；“怜孤恤寡”“扶危济困”，教人对社会弱势群体施以人道的关爱，如此等等，均散发着浓郁的人性的芬芳。

当然，儒家的原创文化也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缺陷，那就是溢于言表的“自恋癖”：以救世主自居，自视太高，太把自己当回事。这一“自恋癖”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毒害可谓至深且巨。在儒家文化熏陶下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其中一些人大都会在不自觉中表现出一种性格上的畸形：孤芳自赏，自命不凡，文过饰非，争强好胜，贪图虚名，目中无人，很难与人相处。得意时牛皮吹得震天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落魄时，怨天尤人，感叹怀才不遇，以精神胜利自慰。《陋室铭》之所以能成为千古绝唱，原因正是很有一些落魄知识分子都是它的知音。实际上一座荒丘，能有仙么？一洼死水，会有龙么？陋室之人，果有德么？所以鲁迅笔下的阿Q，本该是一位读书人。

更为严重的是，这种“自恋癖”给民族、国家、社会、人民所带来的祸害也是至深且巨的。翻开历史，就不难发现中国社会有太多的官场争斗均是基于文人相轻、互不买账所引发。王安石变法，应当说是利国利民之举，司马光、苏轼这些人未必见不到这一点，反对变法很大程度上是基于一种病态的心理：对王安石独步政坛的本能嫉妒，你想功成名就，我便不让你如愿以偿。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一批有“自恋癖”的读书人聚集在官场，从而也就为中国的封建官场增添了一道独特的景观：不受器重的人最易结成反对受重用者的统一战线。而且，这种争斗都是将民族大义、国家利益、人民福祉置于脑后而不管不顾的争斗，争的不是是与非，而是输与赢。之所以会养成这种“自恋癖”，也是因为一些儒者对自身价值在认识上分寸把握得不准。所以我认为对文化元典作出正确的解读，如何把握分寸、把准分寸是十分关键的，分寸掌握得准才能见出文化元典精华、糟粕之所在，才能对文化元典作出一个较为客观公正的评价，